



## 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

李濟

「考古學」已經列入我們國家學術機關的研究科目內好幾年了；以中央研究院論，所花的經費差不多要佔每年全院預算百分之三。

至於中國學術界對於現代考古學的興趣，更有十幾年的歷史。究竟他們作了些什麼事情？有什麼價值？這些問題，似乎是曾經參加這種工作的人都應盡量的說明解釋。我個人參加這種工作已經快到十年了，覺得對於這些疑問，有一部份答復的責任，這就是作這篇文章的動機。

要明白中國考古的成績，可以從一段故事說起。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說：「十年前我在一個中學當歷史教員，那時地質調查所在河

南奉天一帶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址，纔公佈出來。我在講堂中於是摒棄三皇五帝不談，開始只講石器時代文化，銅器時代文化。我總覺得學生

應該對於我的這種「認真」的精神，鼓舞些興趣起來。不料全體的學生都以爲我在講臺上講笑話，而報之以大笑，笑得我簡直的不能繼續講下去。我這纔辭掉了我的教職，從新作起學生來。現在事隔十年，情形

是全變了，好些鄉下的小學生也都知道「石器時代」這個名詞了。」

這段談話，我想很可以代表十年來我們對於歷史觀念的變遷。社會上對於三皇五帝的憶念，雖仍覺得戀戀不捨，然究竟敵不過石器時代銅器時代所代表的觀念的實在；石器銅器時代的史實一天一天的增加，現在差不多可以自成一卷歷史。至於三皇五帝是否完全一個神話，自然另是一個問題；但就是仍舊相信這些古聖人的人，對於他們所代表的內容也變更了許多。這一切我們可以說全是考古學發生出來的影響。

近十年來考古學在中國的成绩，有兩件值得稱述。一爲發現中國北部的石器時代文化；一爲確定中國的青銅時代文化。十餘年前，舊一點的史學家篤信三皇五帝的傳說；新一點的史學家只是懷疑這種傳說而已；這兩種態度都只取得一個對象，都是對那幾本古史的載籍發生的。直等到考古家的鋤頭把地底下的實物掘出來，史學界的風氣纔

94986  
發生些轉變。

西洋人對於中國是否有石器時代文化這問題的注意，卻遠在中國之先，故最早發現中國石器時代文化的人也是一個西洋人。但安特生並不是一個專門的考古家或史學家；他本是一個地質學家，因田野工作而得了考古的興趣。他的發現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佈出來。據他所陳列的標本及初步報告，我們知道下列的幾件確定的史實：中國北部自奉天至甘肅一帶有一種很普遍的石器時代的遺址；遺址中除石器外有獸骨、陶器、骨器、蚌器等實物。各種實物的形制，均有河川的地方，尤引人興趣的為一種帶彩的陶器，上面繪着好些幾何式的花紋。這些花紋的組織，雖是隨地而異，但大致是相同的。最注意的是這種陶器頗與在中亞西亞南歐一帶石器時代遺址中所出的帶彩的陶器有很類似的地方。

有了這次的發現，中國古史就漸漸的脫離了那載籍真偽的辨論。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史乘完全消失了它們的價值；由這幾年古史辨論的趨向看，中國史籍所載的若干史實，因考古的發現，反更加證實了。但考古的材料既天天增加，先前所認為中國古史的問題，已不成為問題；可以作辨論材料的倒是地下出土的若干新材料。譬如安特生所發現中國石器時代文化，這是中國的史學家向來沒注意的一件事；向來所謂「難稽」的洪荒，一旦變為一件有物可證的具體的案件，在舊史學家自然是無話可說；在新的史學家因此就開了一個收集史料的方向；

十餘年這類的工夫已經把一部份難稽的洪荒化成一段最可靠的信史，不過這段歷史「信」的程度也是相對的言。人類的歷史總是可以追溯到無人可答的一點。關於這一點就是新史學家也只能意定一種比較近理的解說，以待事實的出現。這出現的程序及緩急卻完全靠他們努力的方向及程度。這裏邊卻也有一種固定的限制；人類的史蹟留存人間或地面上下的並不是多量的，並且全是支離破碎的。將它們一點一點的聚集起來，是考古家所作的第一步工夫。他們的第二步工夫，就是把這些支離破碎的事實聯綴起來。

這幾年中國古史中所辨論的完全是如何聯綴起來這些地下出土的若干新材料。這辨論又可以分三個階段來說：（一）如何把這些材料本身聯起來；（二）如何把它們與傳統的中國史實聯起來；（三）如何把它們與整個的人類史聯起來。這些問題已經有若干經過，若干可記的事實。

仰韶文化出現後，辨論的焦點就是它的時代問題。它的本身經過若干起於何時？訖於何代？它所包含的實物均只能作一個討論的起點，不能給予一個準確答案。因為它只有石器，沒有文字，大家就認為有一個穩當的推論；就是它要比銅器時代及最初用文字的時代還要早些。不過這個推論，細想起來，雖是安穩，仍極混沌；因為那時（直到現在）誰也不知道中國的黃河流域一帶最早用銅及最早有文字是在什麼時代？同時仰韶遺址中包含着另一批實物，卻給予了那發現者不少的

暗示，就是那帶彩的陶器，安特生認為與中亞及西歐所出的有必然的關係；因此，時間的距離，安特生認為必不會很長。所缺憾的，就是安諾文化本身就無時間的標準；它的時間性，也是借着別處的材料定的。這種輾轉依託出來的標準，當然不能給我們滿意，所以它也就成了暫時的一個懸案。

安特生繼續努力的結果，證實了兩件史事：（1）仰韶式的石器時代文化所佔的區域極廣，華北一帶，東自奉天，西至甘肅都有不斷的發現；（2）發展的時代也很長，在甘肅一省就可以有六個分期，最晚的一期已經有銅製的實物。但那標年問題仍是一個大大的疑案。同時考古的努力也得到另一個發展的方向。

一件很可異的事實就是以安特生及其同志在華北搜集彩色陶器遺址的努力，獨在山東一帶沒有發現。揚子江一帶，內蒙一帶及華南情形更完全不同。山東為齊魯文化所在，看那春秋戰國時期的一段歷史，知道它必有所本。河南一帶石器時代的氣候，決不會與山東有大分別，豈有那時山東獨無類似文化存在的道理？本着這個觀念，中央研究院在山東一帶的尋求可以說得到價值很大的收穫。也是石器時代的遺址，最早的發現是在濟南附近龍山鎮城子崖。但它包含的內容與仰韶式的有重要的分別。細陶完全是單色，漆黑發光，薄的與蛋殼相類，形制尤有特別的不同，又有貞卜用過的獸骨。這個遺址也像彩陶式的仰韶遺址，是一個早期人類居住的地方；留下來的東西，雖說都是破碎不

堪，卻都是人用過的。研究院在這個遺址發掘了兩次，出來的遺物現已整理就緒，快出版了。關於這個遺址的中心問題自然是它與仰韶文化的異同所在。這兩造文化相互的比較起來，那相同的地方是：都用石器，都有粗細陶器，蚌器，骨器等，並且石器及粗陶的以及好些蚌器與骨器的形制有好些相類的。那重要的不同的地方，有下列的兩點：（1）細陶的質料與形制；（2）龍山文化有骨卜的習慣，仰韶文化沒有。這些同異都是無疑的含有極重要的歷史的背景。大約一方代表沿海岸育成的東方文化，一方代表與那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觸過的西北文化。但是兩文化似乎都直接一個更老的一樣，同樣的中國背景。

殷墟發掘是近代中國考古界最長的一段工作；現在已經過了五年了，其中雖經過無限的波折，但仍在繼續進行中。到現在已經證明了很顯然的兩件事實：它有比較進步的文字，它代表很進步的青銅文化。因為貞卜文字的記事又證實古史所記的殷商，他的標準的根據又較仰韶及龍山文化穩固得多。關於前六次的發掘，我曾在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作過一次總估計（五七三至五七五頁）今抄於下：

「總計六次發掘所搜集的出土品，以陶類為最多，前後連回研究所的有三百餘箱。這三百餘箱陶類器物中完全無缺者不及十件；能圖成整器者，不到百件，其餘的都是不成器的破片。幾件完整的，大半都是從方圓坑中出來的。這情形很像馬敘爾爵士所說印度西北莫恆佐大羅發掘所得的狀況，證明這個遺址是漸漸廢棄的，那時的居民，都可以從容的把那好一點的東西運到別處去；不是像意大利的那陣或是宋代的鉅鹿似的，因為火災或水災，突然一下變成一個荒邱。這是殷墟成於水災說不能成立

一個最緊要物證。

「就陶質說，殷虛出土的有灰色粗陶，紅色粗陶，黑色細陶，白色細陶，及一種高度燒加釉的陶。灰色與紅色粗陶均是與仰韶共有的；城子崖也有同樣的灰色粗陶。黑色細陶爲城子崖式，彩陶爲仰韶式，只白陶與高度燒加釉陶爲殷虛所獨有。就形制說：圈足與平底類爲最多；圈底三足類次之；圈底單足，凸底，四足，又次之。形制已專化的有甗、甗、皿、盤、尊、爵、洗、壺、甌、盃、碗、杯、罐、缸等；這是單就歷史期間有名可定的說。還有幾種形制已極專化，然尚不能定的，如形似將軍盔之侈口圓身單足式，與形似喇叭之侈口長身圈底式，兩種所出均甚多。發掘時爲呼叫靈便起見，一個叫着「將軍盔」，一個叫着「喇叭器」。「將軍盔」似與鎔銅業有關，「喇叭器」的用途，尙不能定。陶器附著品中之最顯者爲蓋與耳，蓋之形狀甚多，有時刻字；耳或作獸頭形，有可穿繩的，很少能容手的，間或有流，均是平行的，沒有上行的。

「陶器上之文飾，除一塊仰韶式之以彩色顯者外，均爲刻劃。粗陶文飾最簡，黑陶與白陶最複雜。文飾之母題有兩類：爲動物飾與幾何形，亦有介於二者之間的符號化之動物形。

「次多之出土品爲動物骨。動物骨中已認定者爲牛、豬、鹿、羊、馬、兔、狗、虎、熊、象、龜、鯨、鸞、雞等；以豬、牛之遺骸爲最多。牛、豬、鹿、羊、狗均有兩種。牛之用兼祭祀與占卜；其餘的或以祭祀，或供食品，或只獵得之擄掠品而已。骨料多用作製器。

「骨器中兼有武器與裝飾品。用器中最多者爲鑿髮之筭與食用之柄；兩種均刻有富麗的花紋。骨製武器以鏃爲最多，間有矛頭；此外多爲滿雕文飾的裝飾品。牛與鹿的角，豬與象的牙，均爲重要之製器料。角製者多爲武器與用器；牙製者多爲裝飾品。

「石器之多不亞骨器，它們的用途較廣。有類似陶器之容量器如皿等；武器有鏃，矛頭，與槍頭，用器有刀，斧，杵，臼，磨石等；禮器有琖，戚，璧，琮等；樂器有磬；並刻作猪鳥，人像以作祭祀建築或裝飾的應用；或琢成特種花紋鑲嵌於他物作裝飾品。石器之原料不一，來源的遠近不同；有類玉者，但尙未發現真正之和闐玉。

「金屬品有黃金塊及小片金葉，成塊的錫及製成器物之合金類的青銅器。青銅

武器有鏃，矛頭，戈，覆等類；用器有刀，斧，鏃等。形制多像歐洲青銅時代之第四期物品。與葉尼塞河流域出土之青銅器。禮器殘片甚多，無完整者，但有作禮器用之大批銅甗可證。青銅所作的禮器，大約在殷虛殷豐以前，都運到別處去了。純粹裝飾用品如「髮簪」，「蚌殼」等亦有青銅鑄成者。占卜宗廟之事多用硃砂，或塗於白陶，或塗於甲骨，或塗於禮器，或塗於樂器。硃砂可煉水銀，亦爲當時所知之金屬料。

「貝蚌多琢成裝飾，亦爲當時通用之貨幣。貨幣多用鹹水貝；裝飾多用淡水貝。

「占卜以甲骨遺留下來的，以無文字記載者爲多，有文字者不過十分之一。甲以腹甲爲多，背甲參用；骨以牛肩胛骨爲最多，羊、鹿肩胛骨參用。

「除占卜文字外，陶器、骨器與獸頭，亦有刻劃文字者。」

自從這篇文章作了後，殷虛又發掘了兩次。出土器尙沒超過上說的範圍，但事實上已漸漸的證明殷虛文化有一部很重要的成分是直接因襲龍山的，這一點我們早就有些料到。骨卜是殷虛文化最顯著的，一個成分，它見於龍山而不見於仰韶，這三文化關係的親疏就很可了然。最近我們又在殷虛發見了黑陶坑，它們的因襲的關係差不多沒有疑問了。不過這不是說殷虛與仰韶就因此沒有關係了，事情沒有如此簡單。我們在第三次發掘殷虛的時候，就得了一塊仰韶式的陶片；這個發現在那時的發掘團中成了一件最興奮的討論的資料。自從龍山文化出現後，定它們三個相互的關係就成了參加實際考古的追求的目標。這種志願居然也得了相當的報酬。現在我只舉一例來說明這件公案。

殷虛的附近有些滿佈陶片的遺址，只因不出甲骨文，就沒引起人的注意。自從研究院開始發掘殷虛以來，我們就感覺到發掘附近遺



址的必要。所選擇的第一個是般虛東南靠平漢路的一個鼓出的地方。土名叫着後岡。發掘是梁思永君一人經手的。作了兩次，他就得了我們天天夢想而實在意想不到的發現。有一篇簡單的記載已經在安陽發掘報告發表了。關於後岡的文化層，他說：

「上層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遺物，中層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龍山文化）的遺物，下層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遺物。每層所包含的遺物裏，不但有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並且有那文化的特殊製品。如果把地層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學的基本原則「翻譯」成時間的先後，我們就可以知道後岡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裏住過；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曾在那裏住過。這簡單的事實是城子崖黑陶文化發現後中國考古學上極重要的一個發現。」

無疑的，這是一個極重要的發現。第二次後岡發掘以後，我們又在後岡西北的侯家莊、河南濬縣大賚店發現堆積情形與後岡相同的遺址。這更可證明這三組文化相互的關係了。當然這裏沒解決的問題還多得很。這只算替中國建築「新中國上古史」的同志開了一個比較可靠的出發點，由此往前就可以漸漸的到那平坦大路。

94989  
以上所談，只在與中國上古史直接有關的範圍內說。近十年來，考古學的工作及成績卻並不限於此。譬如周口店的發現雖屬於古生物學的多，然就最近的工作報告看來，此地的最要緊中心問題，仍是上古史有關的材料。這些簇新的史料，一方面直接自然界的歷史，一方面替人類歷史加一段新解釋；出現的地位又適在中國，自然是中國上古史

最早的一個切面。這些材料也許與現在我們所認的中國民族史不能打成一片，——但這正是我們所應該知道的。所謂舊石器時代文化在他國本來就很少與現代民族有直接的密切的關係。正當的歷史觀是以全體人類為一個單位；其中各個民族只能算這全體的一個片面。由此說去，凡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片面；它的演進是全逃不出那人類全體演進的這個範圍。因此要看清楚一個民族的歷史，我們是絕對的拋不開全體人類的這段大背景。在過去的時期，各民族都由他們誇大狂的本能養成了一種以自己民族包辦全體人類歷史這個習慣及偏見。這種可笑的見解是拗不過自然界的這一件大事實的。無論何民族要認清他自己的地位，寫一部真實的民族史是應該以自然歷史為出發點的。中國民族史自然也應該由此着眼。所以周口店的發現同時在自然歷史人類歷史與中國民族史均佔同等的重要的地位。一部完全的新中國史之應該由此出發也是毫無疑意的。

以周口店式的問題為中心，近幾年在中國北部的所尋的考古的材料也積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德日進、桑志華、兩神甫在無定河一帶所發現舊石器的遺存。我們對於中國境內的舊石器時代存在雖原無很大的希望；現在卻證明過去的這些希望或失之於「儉」了。繼續的努力說不定還可以尋出好些關於這段歷史的新材料。中國的洪荒之世，或將如泰西一樣，也可有人類幾篇最有趣生活的遠距離的寫照。

中國這幾年的考古成績大致是如此。這種工作是否可以維持下

94990  
去，我不敢斷定。現在教育界的輿論，是充滿了利用厚生的觀念，大部分人都看這些事情為不急之務。對於這些事務，各人有各人的估計。這以下我只寫一點我個人的感想，並不爭什麼是非。

中國人很早就得了一個好古的名譽，這種名譽是否值得稱讚的當然另是一個問題。不過就實際考察起來，我們民族未必真正有這種癖好。假如我們以保有古物的能力為例，我們不但比不上歐美，連日本也比不上；而日本保存古物的熱心卻也並不是完全仿效西洋的。由這幾年的趨勢看，中國毀古的能力恐怕要超過仍何民族。便使大腹的古董商到處都可以作人的上賓，並且最奇怪的，為所謂學術界尊重得了不得；於是提倡風雅的也就是他們了。這裏邊卻包含着好些悲慘的事實，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若是我們認定地下古物是寶貴的歷史材料，有保存及研究的必要，我們至少應有下列的幾個基本的認識。這種認識並不是以見於國家法令為止，應該成一種一切公民必須有的訓練。

(一) 一切地下的古物完全是國家的，仍何私人不能私有。現在我們政府已有好幾種法令包含這種認識了，但事實上，這種法令差不多等於無效。古董商的勢力現仍佈滿全國；在內地他們分區的賄買各處的地痞流氓，勾結土匪軍隊掘墳盜墓私運到各大鎮市，向國外輸出。對於這種犯法的行為，官場中差不多是漠不相關。有時是因為這些主管的人沒有實力禁止他們；有時簡直是互通聲氣，坐地分贓；還有一般

根本就以為這不值得費力去執行這種法令。這些掘出來的古物，一到城中所謂紳士的手中，就得了欣賞讚美，收藏人的社會身分反因此而加高了。所以物質上精神上作古董商的人，都有相當的排場。資本雄厚一點的並且可以雇些下等的文人捧場，印刷些書籍加重他們的身價；真正研究學問的讀書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非投降他們不可。這種可憤的事實竟被社會認為當然的，豈不真正奇怪。本來中國人的古董癖已有好幾千年的歷史。這種惡習慣要一改變起來也不容易。現在我們所希望的是讀書人應該知道這種習慣絕對的不必獎勵。凡是一件到古董商手的古董均代表好些珍貴史料的摧殘消滅。這都是有考古經驗的人所能證明的。一件有文字的銅器，到市場就代表好些與它同出土的史料永久的消滅。這種損失不是人力所能補救的。社會人士只管了這一件古董的欣賞，絕不注意到它所代表的絕大的損失，豈不可怪！世界上凡是有點現代知識的文明的國家，沒有不禁止這種摧殘古文化遺蹟的行為的。連埃及印度高麗就很少幹這種事。風雅的中國士大夫們不應該感些慚愧麼？

(二) 國家應該設立一個很大的博物院訓練些考古的人材，獎勵科學發掘並系統的整理地下的史料。這個建議也許好些厚生派的朋友要視為不急之務。但實情並不如此。我們若要發揚民族主義，對於民族的歷史絕對的不能漠視。我國的革命與蘇俄有一個根本的不同；蘇俄的革命完全以經濟為目的，沒有什麼民族的意味；我國革命，卻以

民族主義爲主要立場，這個立場在自然歷史中有雄厚的根基，在最近的將來也絕不會有什麼變更的。要發揚這個主義，除了歷史的訓練，又有什麼別的方法？並且這也不是要消費很多錢的一件事。我們只希望教育的當局認清這一點，稍爲擰節一點無謂的浪費，辦一個極需要的國家博物院就綽綽有餘了。

(三)就各大學之一設一考古學系。要從事這一類的工作，必需

要有一個可以訓練人員的地方。這件事不是博物院或研究院所能得到的。中國現在治歷史的人，往往太缺乏自然知識的預備，考古工作的人必需要這種的訓練，然後對於他們所治的題目纔有正確的認識。尤其要緊的他們應該有一種人格的訓練。最少的限度他們應該能拒絕從「考古家」變成一個「收藏家」的這個魔鬼似的引誘。

二十三年，三月，六日。

## 莫斯科的飛機研究所

莫斯科中央航空水力學研究所成立於一九一八年，最近舉行十五週紀念。該所爲柔科夫斯基所創設，當時科學工作人員共三十六人。其最初製成之三翼機，竟不能起飛。其後經驗漸增，所製之四翼單翼機乃告成功。一九二一年起該所開始製造全金屬飛機，而蘇聯今日在此等飛機上遂佔先進之地位。繼ANT-1及ANT-2號而起者爲ANT-3號。蘇聯著名飛行家格羅木夫即於一九二六年乘此機歷訪歐洲各國之首都。其後該所製蘇維埃國家號飛機，馳名全球，彼曾自莫斯科越西伯利亞與太平洋飛抵紐約城。其所製ANT-9九號機，現正飛行於蘇聯各主要航線。現時正在製造世界最大之民航機「ANT-20」號。該研究所現時已成巨大之航空研究機關。特設一風力管，直徑六公尺，各種模型須在此管試驗。同時用強烈電扇鼓成氣流，其速率每小時爲三六〇公里。水上飛機之模型須在運河內試驗，該河長二〇五公尺，闊十二公尺，深六公尺，其所貯水約一百萬加侖。